

浅议佛教文化在陇西的传播与盛行

常霞

(陇西县博物馆,甘肃 陇西 748100)

[摘要]本文介绍了陇西佛教传播的见证、数量众多的寺庙遗址、庞大的信教僧侣、闻名全国的高僧以及珍贵的佛教文物,从而说明了陇西是佛教向中国传播的重要地域,有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同时,佛教在陇西的兴盛证明了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陇西;佛教传播;佛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52-02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并和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在中国形成了大乘和小乘佛教以及其他许多支派,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异常深远。

陇西地处丝绸之路重镇,外商、梵僧来华多从此经过。故佛教传入陇西较早,历史上早就寺院林立,高僧辈出,佛教风靡,臻于极盛。清乾隆《陇西县志》载:“陇人好佛而喜施,故寺多于观。”清同治以前,城郭内外寺庙建筑规模宏伟庞大。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有不少学者、高僧至今为世人所敬仰。一些中国佛教信仰者西行求法,主要有三国的米士行、晋朝的慧睿,都是从四川西南出发,翻山越岭经陇西西行,一直到达南天竺。他们回长安后与鸠摩罗什一块译经,并著有《游历各国传》、《十四音训叙》。西方高僧及翻译家也东行我国弘传佛法,最早的是公元初年从印度来的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译有《四十二章经》。从此之后,中国正式有佛教、寺院、佛像和经典译出。佛教传播无论是西游还是东行,主要行程路线都历经丝绸之路。炳灵寺石窟开凿于西秦建弘元年(420),麦积山石窟开凿于北魏景明三年(502),后秦发基于陇西,姚兴请鸠摩罗什到长安传经必经陇西。所以,佛教传入陇西最晚也是在东晋南北朝时期。

唐时,佛教在陇西大为盛行,仁寿山“十方禅院”就始建于唐代,孟家栋《重修天竺寺碑》记载:“有唐观音院……后元帅汪公奉敕命于僧雪庵时易今额曰‘敕建西天竺寺’。”元代建造万寿禅寺、宝庆寺、天竺寺也得以重建。此时,陇西地区佛寺渐多如大城有钟灵寺、青龙寺、妙华寺、卧龙寺、宝光寺、兴隆寺、积庆寺,北关有报恩寺、大雄寺、香山寺、普济寺、普陀寺,东关有佛慧寺、蟠龙寺,南门外有仁寿寺、妙光寺等20多所寺院。还有文峰镇的暖泉寺、卧龙寺,三台乡的赤岩寺,碧岩乡的碧岩寺等,都是以供佛为主的寺院,主要供奉如来、观音、菩萨、韦陀、弥勒、四大金刚、四大天王、十八罗汉等佛教神像。所以说元

代是佛教在陇西的鼎盛时期,而出土于陇西的元代舍利塔即为实物见证之一。

“舍利”是梵语音译,意为人的遗骨。古印度时,人死后存在埋葬与火葬两种葬俗,埋葬的遗骨称全身舍利,火葬的残骨称随身舍利,佛骨称法身舍利。据说,佛舍利都晶莹洁润,焕发着神异的光彩。而佛身所化形成大小不等的许多颗粒,被称为舍利子。舍利塔即供奉法身舍利的覆钵式陶塔。塔本为敬存佛骨而建,是佛教特有的建筑形式,佛寺必有塔,故亦称塔为“浮屠”。《魏书·释老志》云:“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粉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之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塔因此而成为佛教的象征。

陇西县博物馆现收藏元代舍利塔五座,除三座素陶外,其余两件均采用琉璃烧制,造型精巧,极为珍贵,属国家一级文物。此塔于1984年4月出土于巩昌镇头坪山北坡。红陶质地,高90厘米,底径33厘米,由塔刹、塔身、底座三层叠合而成。塔座为正方形束腰须弥座,座四角有承托力士。塔身施白色,局部施绿黄琉璃釉。正面中间为佛龕,龕内一佛像结跏趺坐。塔身上部为束腰多角台阶;中部饰狮首衔串珠璎珞,雕琢最为精美;下部饰琉璃束腰仰腹莲一周,使全塔华丽生辉。塔刹顶为葫芦形宝珠,下部为下大上小的圆锥体十二相轮。整座陶塔线条流畅,色彩鲜明,古朴庄重。据考证,这种覆钵式陶塔在宋代墓葬多有发现。琉璃舍利塔的出土为研究14世纪中叶陇西地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证据。佛像呈现于塔身,使此塔成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一个缩影。

释迦牟尼是佛教的创始人,相传他29岁出家修善,在深山密林中历尽艰辛,静坐苦修六年方悟道成佛。他随后到各地传播佛法,建立僧团,成为信徒非常敬重和崇拜的智者和觉者。

甘肃省陇西县博物馆还藏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高

90厘米,系檀香木雕刻镏金而成,整体为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莲花台之上,两手搭膝上仰,双指相扣作禅定形象。佛像头顶饰螺髻,身披锦袈裟,宽额圆脸,两耳悬垂,修眉慈目,含笑下视,端庄而雅致,刚毅中流露慈祥。整座佛像制作工艺精湛、灼灼放彩、肃穆典雅。

关于这尊释迦牟尼佛像“落户”陇西,还有一段奇巧的故事。清代康熙年间,有一位高僧名比丘无达,朝拜浙江东海普陀山后,以募资奉请了释迦牟尼、韦陀、关公和观音四尊檀香木佛像,用一条扁担肩挑这四尊佛像,发愿要徒步万里,沿丝绸之路西行去西天。他沿途募化,风餐露宿,历尽艰辛。由于长途跋涉,朝夕沿途化斋,他的身体日渐消瘦,于康熙七年(1668)抵达丝绸之路南路重镇陇西翔秦门时,竟倒地不起,恰遇一位胡姓居士相救,将其搀扶回家歇息医病。比丘无达和尚终因劳累过度而逝世,临终之前托付胡居士将释迦牟尼、韦陀、关公和观音四尊佛像留在陇西建寺安座。胡居士遵嘱与陇西众佛教信徒集资于陇西北关建起一座宏伟的补陀西院(俗称普陀寺)。大殿坐西朝东,始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进深12米,高10米,32朵斗拱,歇山屋顶,飞檐翘角,檐下共施32朵斗拱。殿顶九脊十鸱吻,角科为如意斗拱。殿前有明廊,石砌台基。内部为九檩八椽三架梁结构,造型十分精美。这尊檀香木释迦牟尼佛像与其他三尊佛像才在陇西“安家落户”,接受众僧俗的礼拜,为文化古城陇西增光添彩。清咸丰七年(1858),对普陀寺又进行了维修。现为陇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00多年过去了,这尊精美的檀香木释迦牟尼佛像依然端坐在莲花台之上,含笑俯视今日之盛世美景,永远流露着智慧与关注的目光。

明末清初的陇西书法家王了望晚年也信佛,与游方高僧敏和尚结为诗友,相互吟唱,钻研佛经。杨凌霄集志碑文记载,清康、乾年间,城关各寺院常住有名僧,而当时佛寺的增充和修葺,全由僧众苦行募化承担。陇西天竺寺有不少砥节励志的高僧,先有福贤承担修复大任,后有若石创建水陆圣殿,殿堂楼阁,亭台廊房多达百栋以上,故民间有“天竺寺,门儿多,进了庙门摸不着”的口歌。陇西寺庙建筑规模之雄伟、雕塑工艺之精巧,堪与中国著名佛寺相提并论。特别是千眼千手佛、南海观音塑像,据传出于西来匠师之手,工艺价值极高,在全国亦属罕见。

陇西佛教的派系大多属于北传佛教(即大乘派)系统,有的则属于藏传佛教的格鲁派(俗称黄教)。格鲁派大约于明永乐七年(1409)传入陇西,是年皇上下令重建天竺寺,并给住守藏僧赐有诰文。清代也给该寺赐有帖文。可见该寺已成为全国性寺院,来往挂锡的高僧也颇有其人。如高僧雪岩老人,俗姓米,陇西人,宋咸淳二年(1266)剃度于万寿寺,精修戒律德。德佑元年(1275),他去河南白马寺听讲《华严经》而名声大震,后游至京,赴万僧会讲

《维那经》。他声音宏亮、辩才无碍,授“广辩大师”之号,在“万僧会”名居第三。明代高僧答黑麻失里,受到明宣宗褒奖。镇智,字东辉,俗姓赵,陇西人。幼业儒,有离尘志,出家妙华寺,明万历十三年(1585),讲法于山西五台山,颇有名声,皇上赐给紫衣、帽、履,善写诗,有“石竹无心招玉凤,秋波落日浴金鹅”之句传世。清代释性昭,人称僧和尚,勤于典籍,学识渊博,云游浙、闽、江、淮,康熙二十八年(1689)来陇西,住邑东郊蟠龙寺七年,善诗,著有《九疑集》四卷。达捷扎世喇嘛,陇西人,俗姓邓。出家于天竺寺,尊亦世达捷为师,后听讲于洮阳(今卓尼)禅定寺,诵阅经卷百余。

铜雕造像艺术是藏传佛教的特征之一。陇西县博物馆收藏的释迦牟尼铜像是清代文物。头顶螺髻,须弥座,左臂弯曲,左手放在足上,右手抚膝,作说法印;高鼻深目,双眉高挑,两眼微合下视,着斜肩大衣,结跏趺坐。整尊佛像造型洗练,说明清朝时期佛教文化在陇西盛行。陇西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佛二弟子铜像、菩萨铜像、药师佛铜像等文物充分反映了佛教文化在陇西的传播和盛行已达到了鼎盛时期。

1945年,武山县华严庵住持和尚印光大师的徒弟慕老法师带其徒弟释广福、释崇鑫来陇西弘扬佛法,住锡县东大街宝光寺,于1947年成立了甘肃佛教会陇西分会,由马诚之任会长,释崇鑫任副会长。1952年,甘肃佛教会陇西分会改名为陇西县佛教协会,会址设在东大街卧龙寺。随着改革开放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全县信教群众逐年增加,1980年约300人,1991年已达1300人。经审核正式批准开放的佛教活动场所九处:安家门卧龙寺、仁寿山十方寺、三台法源寺、首阳广佛寺、湾儿坪慈灵寺、苟家门三圣寺、通安驿凤凰寺、东四十铺兴福寺、柴家门东林寺,这样佛教文化在陇西更进一步得到了弘扬和升华,也更加全面、完整地表现了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演变。

综上所述,由佛教文化在陇西的传播,我们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可领悟到佛教文化传入华夏之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影响和改造的关系。一方面,佛教思想必然对中国原有的宗教观念及文化习俗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同时也给中国的传统思想注入新的内容,使中国的民间信仰大都打上了佛教宗旨的烙印;另一方面,佛教为了立足生根,又不得不从华夏文明中汲取营养,将本土文化中久已深入民心的东西合并到佛教体系中去。因为任何一种宗教传播到异域,必然要和当地文化习俗产生某种程度的融合,否则很难在不同的人文背景下生根、发芽。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盛行能延续至今的原因。当然,佛教在陇西的传播与盛行也不例外。